

期刊·观察

重温春日的人间烟火气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郑文丰 文/图

立春后,太阳直射点继续北移,日照时间渐长。随即而来的雨水、惊蛰过后,东风解冻,蛰虫始振,在寒冬与春寒中钝感了的身体渐渐苏醒过来,生活终于发生了一些不一样的变化:熙熙攘攘的人流回归到了我们的生活中,街道又开始变得热闹起来,各地的旅游业也在逐步恢复……总之,每个人都全心全意地投入到生活里,走路都带风。每一个人都对如何过好这个春天,充满着期待,跃跃欲试。

这诸多“不一样”,在《三联生活周刊》的盘中是“身上衣袋口中食”。盼来了春天,随着厚重衣物的褪下,换上春装的身体终于感觉轻松了一些。“衣服迷”张爱玲在《更衣记》里写到,“人们没有能力改良他们的生活情形。他们只能创造他们贴身的环

境——那就是衣服。”对当下的我们来说亦如此,不如意之事固然是十之八九的,工作、情感、学习等方方面面无不需要“心上修、事上磨”,这背后是巨大的精力付出,且结果还只能是“尽人事,听天命”。故而经历多了,会更加懂得“对自己好一点”的重要性。给自己添置一件新衣服,成了触手可及的快乐,何乐而不为呢?

依循这一逻辑,吃点好吃的春日时令菜,也是对自己好一点的体现。春天要吃春菜,而春菜要做得清淡、保有食材的原

味——这种“不时不食”的饮食理念,是中国人对自然的独特理解和生活智慧。它指的不是食材和时节的匹配,更强调身心、环境与食物的相辅相成。人们希望依靠自然的本真味道,尽快回归身体的轻盈和精神的自由。或许也是因为这个原因,强调健康和营养、关注食材和烹饪方式的轻食,正成为当代人健康、科学的生活新风潮。换言之,“吃”的背后是一种新的生活方式。

《新京报·书评周刊》同

样做了“春日吃菜”的文章。文章写道,凛冬已尽,春阳始和,虽尚有几分料峭轻寒,但昏黄衰草枯叶之间,已然滋生出朦朦胧胧的绿意,纵然历经千摧百折,依然能年复一年绽放出新的生机。春日吃菜,吃的正是这一份勃勃生机。这样一来,春天是可以味道描绘的,细心的人能从食物中吃阳光和微风的气息,很多时候吃上一口就能感受到蓬勃的生命力。只要保持足够的好奇心,人总会通过味蕾在这个季节里发现新的温情,并且重拾对未来应有的展望。

“过春天的一百种方式”——《新周刊》索性做了这样的盘点,说的是春天到了,在各个社交平台上,一场无声又轰轰烈烈

的“打卡春天内卷大赛”也如期而至,从传统的踏青、赏花、放风筝,到近几年兴起的野餐、露营、徒步等等,有一百种方式过春天。在众多活动中,最具有“过春天仪式感”的,非野餐莫属。草地上、树荫下、湖水旁,都“长满”了各色餐布,餐布上摆着的果品酒水、鲜花餐点,伴着春色被一口吃下。不只野餐,露营也是许多年轻人的心仪之选。挑一个周末,选一片山清水秀的郊外,约上三五好友,带上猫猫狗狗,开启一场逃离城区的特别之旅,不失为当代年轻人所追求“向往的隐居生活”的某种平替。

不论用哪种方式过春天,都要记住过春天的核心要义是不赶时间。可以为一朵花驻足,被一幅涂鸦吸引,也可以随时走进一家有趣的街边店铺,慢慢去感受人间烟火气。春天,正适合我们去重拾好奇、敏感等人类日益稀缺的品质,感受散落在生活中的细碎却真实的美好。

文学期刊

自然来稿里的文学新人

《天涯》2023年第2期,双月刊

随着网络文学的兴起以及AI写作工具的应用,文学创作面临着大繁荣、大机遇和大挑战并存的局面。文学作品的体量固然如海,但能站立浪头、翻起浪花,仍是少之又少。这其中,知名的文学期刊仍发挥着大浪淘沙、披沙拣金的价值标尺功能。《天涯》在最新一期的杂志中推出“自然来稿里的文学新人”小辑。小辑刊发了七位青年作者的八篇小说,从稿源上看均属于自然来稿,且作者都是文坛新人。

具体说来,羽瞳的小说《线》,将故事发生地放在了她的家乡。她的老家锦州在解放战争时期是一座重要的城池,随后迎来了发展的繁荣,以及相对的衰落。生活在其中的人们,也慢慢地苍老、新生。作为东北人,羽瞳在创作中天然地记叙着东北一方,以及东北土地上孕育的子女;骨子理有冰碴,血液里有火焰,是祖宗传下来的寒冷和磨难,也是千万年来不曾衰竭的顽强与乐观。对于这样的生存状态与人物性格,作者的写作很有东北的特质,文字锋利得像刀子,那片土地的肃杀、粗砺和荒凉,会从小字里行间冲撞出来。这样有质感的文字,让人想起她的东北老乡、文学前辈萧红。

《正午》是作者章程真正意义上的第一篇短篇小说,作品描写的是物质匮乏的乡村中两个以精神为食粮的“异人”,一个整天痴迷于造字;一个疑似用“我”的记忆来建造另一个“我”,并将这个苦苦思索的过程写入一本神秘日记。这不是一个描写风俗人情味的“乡土”故事,它具有开掘精神深度的现代性。这种叙述风格,体现了作者的创作追求:着迷于造成偏执者是如何走向



疯癫的外界因素,以及这类人在一种特定的社会环境下的生存状态。此一念头成了他写作这篇小说的驱动力。

罗志远的小说《夜行家》刻画了几个平凡的小人物:为了维持生计不得不去“开黑车”的罗团结;自幼体弱,技校毕业后迟迟找不到工作的罗小小;刚退休就得去打工补贴家用的“我妈”;一直没有转行的实习护士肖小晓;因被老板怪于顶替而失业的孙涛。可以说他们都处于不同的失意状态,之间也没有什么尖锐的矛盾冲突,作者截取年末这样一个时间段为他们搭建舞台,读者即是坐在场下的观众,平淡的生活随洪流而过,演出在恰到好处的时候结束,不需要变化,也不需要成长,甚至连结局都不需要,他们怎样来的,就怎样继续走下去。《夜行家》和当前大部分的青年写作不同,作者并未刻意关注题材、地域、性别、语言、结构、技巧等一切能够成为议题的问题,也正因此,作品反而呈现出作者可贵的朴拙与本真。

当代文学的女性色彩

《民族文学》2023年3月号,月刊

最新一期《民族文学》杂志推出女作家专号,来自16个民族的老中青三代女作家,带着小说、诗歌、散文、翻译、评论等各类文学文体亮相,集中呈现了当代文学中属于少数民族女性作家的亮丽色彩。

壮族女作家陶丽群的小说《海边的火光》讲述一个有关母爱的故事。故事中,女主人公乔黛曾在无意识的状态下遭受了性侵害。因为伤害是在无意识中发生的,故而女主人公对具体的经历并不清晰。也就是说,在作者的设定中,“伤害”是忽明忽暗、若隐若现的存在,正是这种模糊化的处理,主人公回归生活常态的过程就不断延迟,伤痛也因此潜伏在心中,随着记忆随时被激活——这种对“伤害”的设定与认知很女性化;无论过去了多长时间,那种难以言喻、如影随形的伤痛总是挥之不去。小说围绕个体创伤的疗愈过程展开,展现了精神创伤治愈的艰难性,正是由于创伤修复的艰难性与长久性,随着叙事的展开,内心蛰伏多年的伤痛渐次铺开。

对于陶丽群的创伤叙事,评论家王迅称之为“个体创伤”,从而与“集体创伤”相区别。在他看来,集体创伤和个体创伤各自有不同的叙事美学与主题追求。新时期之初的“伤痕文学”就是书写一代人的创伤,其目标是平复中国社会历史的创伤。而个体创伤则更多是个人际遇所带来的精神创伤,与历史与时代之间的关系没有那么直接。从这一维度观察,陶丽群的创伤叙事是个人化的,是直抵内心的,在个体精神书写的意义上体现了创伤叙事的审美维度与主题追求。



本期杂志还推出了朝鲜族女作家、翻译家郑风淑根据作家许连顺的朝鲜语长篇小说译介的《流水有情》。提及翻译文学,读者的第一反应往往是英语、日语、西班牙语、法语、德语、俄语等语种的文学作品。实则我国不少少数民族有属于自己的文字系统和民族文学传统,将其中的优秀作品译介为汉语,也是一项意义重大的系统工程。郑风淑的工作可称之为一个代表。本期杂志还特意设置栏目,邀请少数民族女性作家发言,郑风淑在列。她说:“翻译是架起不同语言之间的桥梁,是一座彩虹桥。虽说艰苦些,但非常有意义,也有收获感。我选择翻译作品时其实很挑剔,比如思想性、时代性、艺术性都要考量。我认为,一部好的作品要彰显正义的力量,对生活有独特见解和善意,对人物命运同情悲悯,给人以生活的勇气,当然,结构、语言等艺术表现力也要好。”

读书期刊

与文澜阁《四库全书》相关的浙江图书馆诸先生

《书城》2023年3月号,月刊

清乾隆时期修撰的《四库全书》,历来有“典籍总汇,文化渊数”的美誉,基本囊括乾隆中期以前中国历代主要典籍,涵盖了中华传统学术文化的各个学科门类,涉猎古代中国几乎所有学问领域,被奉为中国文化史上的“万里长城”。书成后先后续写七部,分藏南北,其中,藏于杭州的文澜阁本命运最为多舛,也最为传奇。最新一期《书城》杂志刊发文章,以文澜阁《四库全书》为脉络,梳理与此相关的浙江图书馆的诸位先生。

晚清时期内忧外患,战火四起,杭州文澜阁“阁书散”,重新抄书、聚书,是当地有识之士的夙愿。杭州藏书家丁申、丁丙兄弟抢救残篇八千六百八十九册,不足总数的四分之一;后又据《四库全书总目》搜罗善本进行补抄,抄书二万六千余册。民国年间,浙江图书馆首任馆长钱恂继续补抄工作,称之为“乙卯补抄”。文章介绍,钱恂出身于清末湖州的名门望族,是钱稻孙的父亲,钱三强的伯父。钱恂出过洋,出使欧洲;协办过洋务,主持新式学堂。辛亥革命后到任浙江图书馆,任馆长期间,隔壁文澜阁的《四库全书》,编写文澜阁补书目录,组织补抄文澜阁所缺的图书,用八年的时间抄书三十三种二百六十八卷,同时还购回旧抄一百八十二种。此外,他还注意到杭州西湖孤山脚下的“文澜阁”潮湿,不利于珍藏《四库全书》,于是重新寻找了合适的藏书之所,此后便成为浙江图书馆的馆藏。继钱恂先生之后,浙江海宁籍著名学者张宗祥又发起“癸亥补抄”。文章写道,张宗祥时任浙江省教育厅厅长,与时任浙江图书馆馆长的章仲铨共同商议,核对十多年前钱恂先生编的《四库全书》缺书目,继续补抄事宜。张宗祥通过募捐解决补抄的经费问题。此次补抄总共抄书二百一



十三种,五千六百六十卷。

经三次补抄,历四十七年,劫后重生的文澜阁本具备了独特的文献版本价值:从数量上看,四万二千五百五十九册的总数较原版的三万五千九百九十多出近六千册;内容上弥补了原本中漏抄的部分,还恢复了朝廷对原文篡改的部分,成为集江浙省几代学人心力的“百衲本”。文章还介绍了抗战时期和《四库全书》共命运的毛春翔先生。抗战开始后,文澜阁《四库全书》在日寇炮火的紧逼下,由四十岁左右的毛春翔和图书馆的同事日夜陪伴,一路护送到贵阳,一路颠簸到达贵阳郊区地母洞,才算安定下来。当时为了守护这些国宝级的图书,毛春翔等人一直居住在地母洞,夏天任凭蚊虫叮咬,冬天阴冷潮湿。随着敌人的战火即将烧到贵阳,他们又迁移到重庆的青木关。十四年抗战的颠沛流离,珍贵图书《四库全书》有毛春翔等先生的精心守护,才能够传承下来。

博物期刊

正是河豚欲上时

《博物》2023年3月号,月刊

东坡先生的一句“正是河豚欲上时”,其中蕴含的诗意与饕餮,充分显露了他同时身为美食家和大文士的存在。最新一期《博物》期刊即以以此为主题,介绍传统中国在春日时节的传统美食。

首当其冲的便是河豚。自神农尝百草以来,人类在进化当中逐渐找到了适合自己的食物谱系,其中绝大部分是好吃又无毒的,但有一些是明知有毒,却又让人欲罢不能,甘愿以身冒险的美味,最典型的便是被誉为“长江三鲜”之首的河豚。

我国传统中食用最多的河豚,是暗纹东方鲀。暗纹东方鲀成年体长15至30厘米,腹部白色,背部棕褐色,有4到6条不明显的暗褐色宽横纹。在中国,暗纹东方鲀平时分布于东海、黄海和渤海,每年春天就会由海入河,游进长江下游水域产卵。苏轼的名句“蒌蒿满地芦芽短,正是河豚欲上时”,描写的就是这种季节性洄游。和捕捞其他鱼类一样,抓河豚可以网可以钓。但河豚有多美味,便有多毒。河豚毒素是自然界最强的神经毒素之一:一只河豚所含毒量,足以杀死30名成年人。河豚毒素不但毒性强烈,还非常稳定:盐腌、日晒、蒸煮都无法分解。要彻底破坏该毒素,需220℃以上高温加热20至60分钟。但如此烹饪即便解了毒,肉质也无法食用了。为了这一口美味,古人想了很多解毒方法,但都经不起检验。直到现代,才有了不玩命也能吃河豚的办法,即挑选长得快、毒素少的河豚,进行多代选育,使后代毒性逐渐降低。从野生河豚算起,培育到第五代就基本无毒,且基因能稳定遗传。不过“去毒版”河豚上桌时,为保险起见仍需剔除卵巢、肝脏、眼睛等蕴含剧毒的脏器。

解密王勃

《博览群书》2023年3月号,月刊

仅是一篇《滕王阁序》,一句“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王勃便在中国诗歌史上名留千古,妇孺皆知。王勃今存诗80多首,存文《赋和序、表、碑、颂等》90多篇,为“初唐四杰”之首,并同其他“三杰”一起,共同为声律和骨风兼备的唐诗揭开了序幕,也在唐诗发展的进程中竖起了这一块里程碑。历史上的王勃才高八斗而又英年早逝,留下许多历史谜题,最新一期《博览群书》推出专辑,解密王勃。

王勃出身文化世家,祖父王通,即一代大儒“文中子”;其叔祖王绩,乃隋末唐初著名诗人。王勃天赋出众,才华横溢,是“六岁解属文”的“神童”,年末及冠即登科入仕。随后却迎生命转折,一路遭受贬谪,甚至牵累家人,最后渡南海时坠水而亡,生年27岁。对王勃大起大落的际遇,南通大学文学院王志清教授在专辑“主持人语”中归结为与其“恃才傲物”的性格有关。王勃具有很高的政治热情,非常渴望建功立业,王勃的诗写得意气风发,壮怀激烈而又神采飞扬,充分表现出他不甘人下的进取精神。但这一诗人风骨,在“伴君如伴虎”的年代也是弱点,最终“因刚而折”。

虽说王勃的生命如流星一般短暂,但其文学成就不可磨灭。他擅长五律和五绝,反对绮靡文风,提倡表现浓郁的情感与壮大的气势。一些常见的题材,也在他手下常有新的写法,显得意境开阔,不落俗套。李朝杰《王勃为何能超越“老成诗境”》、杨晓彩《年轻的王勃为何在“繁华易逝”上出众》二文,分别从“破”与“立”的角度,揭示了王勃的诗歌风格及其由来。

所谓“破”,即是破除“老成诗境”。文章



写道,初唐时,诗歌的创作已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创造出不同主题、不同场景的作品,如送别、思友、怀旧、羁旅、隐逸等,且各自形成了经典以至程序化的写作套路,在诗歌主旨的沿袭、意象和典故的择取上,都形成了一定之规。其弊端也日益显露,许多诗人在创作时陷入固定的设定之中,这就是“老成诗境”,导致作品总有似曾相识之感。要对“老成诗境”有所突破和超越,需要诗人有极高的创造力和诗性精神。文章将王勃的诗放在唐诗发展史的语境中去考察,勾勒出其诗既传承又开拓的轨迹。

所谓“立”,即解析王勃最为出彩、最有创造性的诗歌,也就是他的“繁华易逝”主题诗,如《临高台》《滕王阁》《铜雀妓二首》等,常有“兴亡无常”“人生易老”的感慨。这类作品虽然不多,却很有思想性,包含着对人生沧桑、历史兴衰的沉重感叹和深沉思索,作者认为这和王勃对天下之理,尤其是社会兴衰、历史存亡、人生成败的高度关注有关。

